

杜拉斯：一位对失败满不在乎的电影人

■ 沈坤或



《绿眼睛：杜拉斯与电影》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陆一琛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1年1月版

1980年，法国《电影手册》推出两期杜拉斯特刊，作家本人分享了自己在电影和文学上的创作心得。7年后，这些文章首次被编辑成书，书名取自其中《绿眼睛》一文。此书在法国多次再版，如今，中文版终于和读者见面。

杜拉斯将《绿眼睛》单篇献给了自己的同行让-皮埃尔·瑟东。1979年，两人在一次青年电影节上相识，当时瑟东不满30岁，他们随后成为忘年交。杜拉斯去世很多年以后，瑟东在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开头写道，“有时候，在我想起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转瞬即逝的片刻里，或者碰巧读到她写的东西时，我对于她所占有的巨大自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也是《绿眼睛：杜拉斯与电影》一书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阅读

感受。瑟东提到的自由，最大程度体现在她所做的选择里。直到《情人》出版前，杜拉斯的小说不算畅销，电影更是小众。而“小众”一词意味着，即使不是她本人，至少她的作品长时间里一直挣扎在“成功”和“失败”的世俗评定中。

杜拉斯自己是怎么看的？她在本书中其实给出过答案。她说，“失败就等于选择的自由。”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自由地选择失败。”当然，这里的“失败”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说一个《绿眼睛》里没有提及的故事，那是在1968年，她的两部戏剧《是的，也许》和《萨迦王国》遭遇了评论界的猛烈炮轰。她在当年接受法国文化台采访时解释了自己创作《萨迦王国》的动机，“我创作了一部基于无意义的戏剧……我厌倦了虚假的深度……”她强调，自己对于这部作品很满意，“我很偏激，但这使我快乐，应该偏激。”

你可以在这些话里感受到一种对于失败的不在乎，甚至是沾沾自喜。这种骄傲当然不是来源于失败本身，而是源于她的个性。无论写作或者导演电影、戏剧，杜拉斯不考虑受众需求，不理睬自己的作品是否需要输出一项价值。她曾经蔑称萨特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因为他写作是为了说教。

这种不迎合、不在乎评判的内心态度让她进有了创作层面的不羁，敢于作出各种尝试甚至是实验。1977年，她和杰拉尔·德帕迪约合作了《卡车》。这部电影里，女主角说了一路话，德帕迪约扮演的卡车司机不得

不倾听了一路。自然，这不是一部为了观众而拍摄的电影。以至于电影放映后，有嘉宾在电视上公然表示，“给杜拉斯钱拍《卡车》的结果，就是让观众们恶心了足足6个月。”杜拉斯轻描淡写地回应他，“没人投资《卡车》。”

4年后，当更具实验性质的《大西洋人》上映前，她明确劝阻一部分观众入场。“法国绝大部分的电影观众有种习惯，他们认为电影是专门为他们拍摄的。我想劝这些观众不要去《大西洋人》。这没有必要。因为电影拍摄过程完全没有把他们考虑进去。”

在长时间里，她电影的固定观影人次就在一到两万人之间。她自称“我们是商业失败的象征。”然而你从她的话语中感觉不到担忧，这很可能和她很多时候自费拍电影有关。这样，她就无须背负我们今天所说的“KPI”指标了。在杜拉斯的时代没有KPI，但这个世界一直是被数字定义的，数字决定一切，向来如此。电影票房、图书的出售册数、以及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的所谓流量，都是数字的游戏。人的个体性被抹杀，我们从数字背后只能看到面目模糊的从众者。杜拉斯因此说，“到处是人群，但没有人。”

就像今天一个严肃的公众号作者，面对自己总也过不了万的阅读量会摇头叹气，“这届粉丝不行”。杜拉斯也曾痛斥自己的同胞只会从众、做应该做的事，“他们去游泳，去日光浴——这能有比日光浴更讨厌的东西吗？但是，他们去做了。他们晒黑了；他们晒黑是因为应该晒黑。”

公平地说，那个时代并不像杜拉

斯认为的那么糟糕，她至少还拥有一到两万名观众。并且还有一批愿意放映“艺术、实验电影”的影院，为初出茅庐的戈达尔和特吕弗们提供了开放、宽松的精神土壤。

我想起自己初到巴黎之际，那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走完的时候，巴黎大小小播放艺术和实验电影为主的影院突然陷入了一阵倒閉潮。整个巴黎、整个法国都被“UGC”“Gaumont”“Mk2”这几大连锁影院所占领。报纸上三天两头呼吁拯救独立影院，但谁都无力阻挡时代的脚步……

人很难满意自己正在经历的时代，“虽然现在一切都在，但以前要现在好得多”，杜拉斯抱怨。但无论哪个时代，那些“晒日光浴”的人永远都在，永远都是大多数。而关注多数者的情感需求，迎合群体情绪的作品总是更容易成功。尤其在今天，借助网络传播，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

《绿眼睛》里，她写了一桩近两百年前发生在摩洛哥海岸的惨剧：成千上万只羚羊从四面八方到此地会合，并集体跳海。杜拉斯对此的解读，是它们受到了神秘的召唤。但在距离她写这篇文章近半个世纪的今天，羚羊集体自杀事件似乎蕴含了另一种隐喻：一种群体性的狂热，不经思考的盲目从众。那也是生活在流量时代的人们的某个侧面：他们成了微博热搜背后的一次点击量，微信公号里的一个点赞以及抖音直播间里送出的一份礼物。“那里只有人群，没有人。”个体剥夺了自身的权利。

翻书·二则

150年前的“上海德比”

■ 孙欣祺

上海是一座有“德比文化”的城市。早在足坛蓝红争霸前150年，上海人已经开始看德比了，只不过当时的德比还是跑马场里的一项经典赛事——德比大赛。

跑马之于旧上海意味着什么？在《异国事物的译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中，张宁给出了一个数据，“在赛季时，上海约有一成的华人居民涌向了跑马场观赛”（第234页）。如果以今日

的上海常住人口来换算，大约有250万双眼睛注视着同一片赛场。而作为一项级别甚高的赛事，德比大赛更是火爆异常。

对于这项发源于英国，却在旧上海引起现象级关注的运动，张宁从文化译译的多个层面探讨了赛马与殖民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在19世纪末的中国，赛马是殖民者维系社会的支柱，“华人精英攀爬位阶的工具”，也是“观看与赌博并存的一项大众娱乐”（第18页）。

不仅如此，赛马更是中国最早的观众性运动，即“除了骑师，大部分的参与者并不亲自从事此活动，而是借由购票入场观看，取得其所提供的刺激与满足感”（第229页）。此类活动现已蔚然成风，不仅足球、篮球、网球等赛事在全球掀起收视热潮，观赏竞技所产生的粉丝现象更是以强大的溢出效应辐射至各娱乐行业。

引入赛马后的早期阶段，上海人只是把这项西式运动当作庙会、斗鸡这些传统民俗的欧化版，其观赏性、娱乐性远超后来日益突出的赌博色彩，正如张宁所说，“华人均视跑马为‘娱人耳目’的盛景”（第234页）。以至于在风和日丽的观赛日，观众们不辞辛劳地奔赴城外跑马场；而在扫人兴致的下雨天，跑马场边往往一片寂寥。

跑马的观赏性由场内延伸至场边。由于跑马场内汇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场内的赛马与场边的“赛人”遥相呼应，这其中最博人眼球的要属旧上海的名妓。“她们招摇过市，放肆地向公众展示自己”，并相互竞赛，比拼装扮、马车、马夫、婢女。倾城而出、争奇斗艳之状俨然成为清末虚假繁荣的代表，引得无数观众垂涎。

在旧上海的跑马场，观赛马与观“观赛马”合而为一，久而成俗，形成一时兴盛之风潮。这股风潮甚至吹向了大洋彼岸。1879年6月14日，美国《哈波杂志》在介绍英国赛马时刊登了题为《去看德比大赛的上海》的木版画，“大家或坐车、或乘轿、或骑马、或步行，万众一心地奔赴跑马场观看比赛”（第239页）。



《异国事物的译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
张宁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8月版

“吃饱了撑的给动物搬家”

■ 苏展

人类很愚蠢，这个形容没有半点冒犯的意思，尤其在评价历史时。看似全知视角的复盘让这个词透出几分戏谑。于是，当翻到汤姆·菲利普斯的《愚蠢的人类》，脑海里当即闪过一个念头，人类到底有多蠢？

菲利普斯用了十章纵览人类在历史中捅出的一个个大娄子并总结道：“人类进步的故事始于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这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但也是这一点常常导致我们把自己变成蠢货”（第七页）。

1859年，24只英国兔子远赴澳大利亚解决一名英籍牧场主的思乡之情。为了让自己的狩猎活动更富有英伦范，这位以复制英国传统乡绅生活闻名澳大利亚上流社会的富裕牧场主托马斯·奥斯汀，把包括24只英国兔子在内的部分传统英国动物运到当地作为他的猎杀对象，“运进来几只兔子没啥坏处。”他说，“而且除了当猎物之外，还能让我有些许家乡的感觉”（第61页）。奥斯汀想当然了，不过这也不怪他。人类在驯养动物的历史进程中早已滋生出无限优越感：以大自然的宰宰之名，让动植物毫不犹豫地听命。

事实总会给自以为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英国兔子很快从移民变成了殖民。接下来数十年它们的子孙肆无忌惮地开疆拓土，“等到1920年代，澳大利亚的这场兔灾达到高峰，兔子数量估计有100亿，相当于每平方公里就有3000只兔子”（第62页）。正如菲利普斯的章节名“吃饱了撑的给动物搬家”。

生命挣脱了束缚，兔子突破了藩篱，不过人类总能想到解决办法——新插一个篱子。1900年代，当搭建1000多英里的篱笆也无法阻挡这批疯狂的“移民”时，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实验用生物战来对付兔子，希望借助疾病干预它们的过度繁殖。1950年代，科学家研制出兔黏液瘤病，弄

死了相当一批数量兔子，但幸存下来的产生了抵抗力，兔子数量很快又开始攀升。1990年代，科学家搞病毒实验，为了降低病毒泄漏并传播到本土的风险，他们特意在远离澳洲南部海岸的一个岛上进行研究。并研制出兔出血症病毒。人类似乎从来不缺乏兑现风险的能力，即便已事先预知。5年后，这种对兔子致命的病原体搭着苍蝇的便车泄漏并传播到了本土；所幸的是，尽管是被不小心释放到野外，但它似乎起到了作用：南澳的兔子数量锐减，植被也得以恢复，“但愿这个兔出血症病毒别再有什么其他副作用”（第64页）。

结局无从考证，或许这个副作用尚处人类有限的认知之外，但我们一厢情愿地希望这个英国兔子的故事已经完结，因为那未完待续的一定是另一个大娄子。或许这就是本书的魅力所在——即使无限接近真相，只要不是绝对真相，那么愚蠢就不可避免，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自然会多几分谦卑。所幸的是，人类从未停止思考。



《愚蠢的人类》
[英] 汤姆·菲利普斯著 姜文波译
文汇出版社 2020年12月版

札记

为了好好做生意，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国家

■ 叶克飞

“低地国家的人民并不钟爱西班牙式的‘服从’。那些城镇希望能有一位君主服从于他们，而不是他们服从于君主，尼德兰的这种制度已经基本符合君主立宪制的所有特征。正是这些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奠定了现代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这两大君主国的基石。”

《海洋帝国的崛起：尼德兰八十年战争，1568—1648》中的这段陈述，写出了尼德兰地区的“不一样”。

“尼德兰”即“低地”之意，范围包括如今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地区。1568年，尼德兰各省纷纷反抗西班牙统治，1588年，尼德兰北部七省正式建立联省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政治权利的国家”。

1648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联省共和国的独立，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就此诞生。此后荷兰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商业和海洋大国。

与一般民族国家有别，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商立国”的国家。人们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也是为了拥

有更多权利以更好地做生意。《海洋帝国的崛起：尼德兰八十年战争，1568—1648》一书，就以普及性方式介绍了这段历史。

早在查理五世时代，西班牙王国就已剥夺尼德兰过所拥有的高度自治权。1556年，腓力二世继承西班牙王位，打造了全球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但他对富庶的尼德兰继续横征暴敛，并极力打压尼德兰的宗教自由，结果引发了尼德兰独立斗争。

书中将最初的矛盾归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矛盾的激化，这当然是历史的真实。但恰恰因为浓郁的“尼德兰风”，尤其是在饥荒时期，新教基于商业体系下的救助模式更为有效。所以，尼德兰人追求的宗教自由，骨子里还是商业社会的选择。

尼德兰人所争取的还有参与权和自决权。西班牙作为最早的航海强国，却未能借助先发优势成为现代国家，完全是过于集中的王权所致。通过地理大发现掠夺而来的巨额财富，并未转化为社会前行动力，反而供王室挥霍。尼德兰则不一样，它有繁荣商业，并懂得如何将之转化为社会前

行动力。面对西班牙人的统治，尼德兰人想维持商业繁荣，就必须尊重商人乃至社会各阶层的私有财产，需要自决权为基础。

这场漫长战争打的也是经济仗。双方最初的军事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西班牙无论军队数量、武器装备还是战术素养，当时都冠绝欧洲，尼德兰军队则是拼凑而成，一度只能勉强防守。

但尼德兰的抗争直接导致西班牙失去占据王国一半税收的“富矿”，税收锐减，军费压力陡增，西班牙军队也因欠饷多次哗变。此外，尼德兰军队在海上表现出色，一方面与航海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发达的造船业和财富支持有关。

也正是战争期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也是第一个发行股票的公司。数十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拥有1.5万个分支机构，游弋于世界的荷兰商船有一万多艘，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还多。



《海洋帝国的崛起：尼德兰八十年战争，1568—1648》
[荷] 安东·范德伦著
杜原译
天地出版社
2021年1月版